

# 女性孤独意识的表达及主体性的书写

——重读一玲《我在霞村的时候》

刘飞娥<sup>①</sup>

(湖南工业大学师专校区 中文系, 湖南 株洲 412007)

**摘要:**《我在霞村的时候》是一玲在女性意识烛照下书写女性主体陷入孤独与困境的名篇,其女性孤独意蕴主要体现为女性主体的孤独书写、女性主体的孤独抗争。这本文本可以看作是 20 世纪 20 年代一玲个人主义思想与女性主义思想的回光返照,具有鲜明的主体性特征。

**关键词:**一玲;我在霞村的时候;女性主体;孤独意识;主体性书写

孤独意识作为人类的一种独特的精神现象,它的产生根源,正如有些研究者所说,“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看,那就是在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冲突中所产生的寂寞、苦闷、抑郁、忧虑等等情愫,以及难以描述的微妙而又波动的心理状态。从哲学角度上看,那就是由艰难痛苦的人生经历而萌发的对自我、人生、社会、自然的根本意义而不能穷尽这些‘斯芬克司之谜’所产生的沉痛、悲哀、彷徨的情感体验”。<sup>[1]</sup>可以说,正因为有深刻的孤独体验和孤独的心境,才有孤独的深刻表达,才能产生深邃的孤独意识。女作家丁玲正是在一种精神的极度孤独与苦闷中跨入了中国现代文坛,其早期作品塑造了一大批被“五四”唤醒而又走投无路的知识女性,勾勒出一个个孤独感伤的心灵世界,从中映现出作家灵魂的痛苦搏斗及其在人生道路上踟躇徘徊的身影,显示了非常独特的女性孤独意识。随着丁玲的逐步左倾,女性孤独的创作主题一度淡出了读者的阅读视野。然而,丁玲经过三年牢狱之灾,于 1936 年 11 月到达陕北以后,因人生遭到误解和冤屈的那种愤懑和悲凉的孤独心绪,重新浮现在她 1940 年到 1942 年的几篇以女性眼光、女性生活感受为构思出发点的作品里,其中《我在霞村的时候》(以下简称《霞村》)是丁玲在女性意识烛照下书写女性主体陷入孤独与困境的短篇

小说名篇。本文拟对《霞村》的女性孤独意蕴及文本的主体性书写作进一步探讨。

## 一 女性主体的孤独书写

英国小说家弗尼吉亚·伍尔夫夫人在散文《小说家给了我们什么》中曾经倡言:“读小说的不二法门,便是让小说的作者对你实行‘独裁专政’;换言之,便是要在阅读小说的时候,全心全意进入作者经营的世界,不能稍加迟疑,否则便会被抛弃于那个世界之外,既然不能进入,当然也就无法欣赏那个特别世界的风景了。”我们品读《霞村》也应该先尝试走进《霞村》,领略这里边儿独特的女性书写的风景。

《霞村》采用的是丁玲擅长的第一人称叙述,采取的是“报告文学”的外在形式,以“我”到霞村的感受和所见所闻为线索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抗战根据地的一个山村里的故事。文本以难以遏制的热情塑造了一个具有个体性格的女性主体贞贞的形象。少女贞贞为了逃避家里包办的婚姻,逃到教堂要当“姑姑”,不幸被日本侵略军掳去做了随营军妓,她的灵魂和肉体都遭受极大的侮辱和损害,心灵上烙下了深深的创伤。在被日军蹂躏的一年多时间里,她忍辱负重,精神上、肉体上做出巨大的牺牲,给游击队员收集情报;然而,在历经种种磨难,带着一身病回到村子里时,不但得不到乡亲 and 家人的谅解,反而遭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冷酷蔑视和恶毒诅咒,在封建

<sup>①</sup> 收稿日期: 2008-02-05

作者简介: 刘飞娥,女,湖南湘潭人,湖南工业大学师专校区中文系讲师,硕士,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意识的包围中感到难以生存。杂货铺老板骂她是“缺德的婆娘”，主张“不该让她回来”；村人们“嫌弃她，鄙视她”，认为她“比破鞋还不如”；自己的二婶也认同传统的逻辑——“小老板的那头亲事，还不吹了，谁还肯要鬼子用过的女人”，家里的父母也以她为羞耻；即使是过去的恋人，更多的也只是怜悯、内疚和同情，“尤其是那一些妇女们，因为有了她才发现对自己的崇敬，才看出自己的圣洁来，因为自己没有被人强奸而骄傲了……”。<sup>[2]234</sup>这种拿他人不幸来赏玩的国民劣根性与片面而荒谬的贞操观在文中相互渗透。作品正是通过这类真实的描写，通过一个有判断、有自我的叙述者“我”的厌恶的眼睛，看到了“古老的封建鬼魂是多么顽固地缠缚在人民群众身上”，<sup>[3]</sup>窥见了“一个由几千年封建小农意识汇聚的无意识杀人团”。<sup>[4]28</sup>作者也正是借此深刻地指出了几千年封建贞操观念的根深蒂固以及它对人们灵魂的侵蚀，矛头直指古老的封建意识。正是这几千年来所形成的“痼疾”几乎把贞贞这样一个为了革命付出自己一切的女性主体，钉入乡村历史的耻辱柱，在乡人鄙弃的眼光中难以存身。所以在本质上，《霞村》是一篇书写女性之孤独与女性之困境的小说。贞贞这样一个有个性、有自我的女性主体，随着她的举动超越了大多数人的道德规范，她便注定遭到乡人的放逐与自我放逐，在封建意识的包围中陷入孤独的处境，在腥风血雨中锤炼了灵魂却遭到无主无形的杀人团的扼杀，陷入现实和精神上的孤独中，生命的价值受到他人的漠视与轻贱。

## 二 女性主体的孤独抗争

然而，陷入孤独处境的贞贞并没有成为丁玲笔下另一个“坦然又决绝地吞火柴而死”的乡村女孩阿毛，从此走向生命的不归路，相反，她不断地与命运相抗争，以图获得主体的尊严与解放。在贞贞身上，我们看到的是生命勃发的力量和她面对孤独的坚韧和顽强，她“比莎菲乐观，光明”。<sup>[5]336</sup>她不但能够坦然地面对自己的苦难，没有想到要博得人们的同情，而且可以不顾亲人的反对和恋人的苦求，毅然决定自己走自己的路。“独立，对一个女人来说乃是第一需要”，<sup>[6]</sup>贞贞对自己新生活道路的自主选择，正是在女性意识烛照下个体生命不甘向命运屈服所作出的孤独抗争。

在小说中，面对乡人们的诋毁，贞贞一律以一种仿佛事不关己的冷漠态度来对付。然而，小说中的叙述者“我”却能透过贞贞的冷漠，发觉贞贞内心深

处的另一面：贞贞的眼睛，“像两扇在夏天的野外屋宇里洞开的窗子，是那么坦白，没有尘垢”；贞贞的憧憬，“到了延安，还另有一番的气象，我还可以再重新做一个人”。贞贞身上，有着一一种对生存本身的执着和尊重，像一株在夹缝中生长的小草，虽然立足艰辛，虽然遭遇风吹雨打，仍然挺直了腰肢，竭尽全力让生命延续。只要还能见到阳光，一切就还有希望；只要还活着，就有机会赋予生命以意义。所以她才会说，“人大约总是这样，哪怕到了更坏的地方，还不是只得这样，硬着头皮挺着腰肢过下去，难道死了不成？”“我总得找活路，还要活得有意思，除非万不得已”。<sup>[2]233</sup>在“无意识杀人团”沉重的压抑下，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在很孤独的心情中，贞贞却能想办法活下去，想办法在崩溃中看见光明，这是一个女性主体对封建贞操观的宣战，对封建小农意识的抗争，显示出最动人最丰富的个性品格。

显然，贞贞这一形象已经不同于丁玲以前所创造出的妇女形象，从外表到内心，她都具有一种惊人的控制力量，能够正确地把握着自己命运的航程。作为霞村中的一个“异类”，她显然是霞村这一环境的叛逆者。她拒绝按照乡人的逻辑当一个“可怜人”，更出人意料的是，她拒绝了初恋情人夏大宝的求婚，决心接受党的安排，继续读书、学习、工作，做一个新人。“几千年来束缚积淀在中国女性潜意识中的是服从和依赖，是惟有靠婚姻、靠男性来‘二次投胎’的生命模式”，<sup>[7]</sup>而贞贞却不再以婚姻作为自己奋斗的最高目标，她拒绝了依附、平凡的命运；她想今后一定要生活得有意义，下定决心奔向新的“光明的前途”。作为一个曾经被侮辱被损害的女性，并没有选择在别人看来的最好归宿，这说明她的自醒是超乎常人的，这是绝对理性的思考结果。她站在霞村人所无法企及的高度上思考着自己的出路，继续前行是最好的选择，这是真正认识到自己价值的“人”的选择。因此，作者赋予了女性生存以更深刻的思考，关心的是单一的个体如何获得主体性，获得“自主和独特”的支配自己行为的能力。她关心女性命运，但她更关注人的命运，人的灵魂：作为一个“人”的女性在那令人窒息的环境中该如何生存下去？在民族解放浪潮的激荡下可以说丁玲给予了女性命运以崭新的思考：女性只有独立自主，紧跟时代革命的浪潮，才能成为真正的个性主体，找到生命的真谛。

## 三 主体性书写的意义

别林斯基曾经说过，艺术作品“不允许艺术家对所描写的外在世界抱着冷漠的态度，而要他在自己活跃的心灵上感受外在世界的现象，从而使那些现象也呼吸着他们心灵的气息”。<sup>[8]</sup>而丁玲自己在回答“写一个好作品最重要的是什么”的问题时，也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写出人来，就是要钻到人的心里面去”，《霞村》正是刻画了贞贞这一人物矛盾的心理状态和孤独倔强的灵魂，使文本呈现出鲜明的主体性书写意蕴。

一方面，贞贞在一种可以说是绝境的情况下，迎来生命的又一个春天。我想，这也是女作家丁玲作为一个创作主体从自己的坎坷经历中所得出的深刻体悟。正如丁玲自己所说，“作家写作品其实也是写自己”，我们从作家最真实的生活出发，才能读懂她心灵的声音。不难看出，贞贞是丁玲投射在心影上的理想女性形象——苦难、坚韧、自主、抱负，因为丁玲捕捉到了一个被侮辱的女性坚强而又向往光明的孤独痛苦的灵魂。我们知道丁玲自己也曾有着与贞贞同样被敌人掳掠过的经历，她们都拥有同样噩梦般的记忆，体验着回来之后相同的压抑感，因此她对贞贞的痛苦几乎是感同身受的。正如野泽俊敬所说，“丁玲被压抑的灵魂和同样被压抑的人们的悲愤产生了共鸣。”尽管丁玲是一个敢爱敢恨、女性主体意识很强的人，但是在延安，她无法挡住别人议论她的私生活，议论她在南京被捕的那段日子，作为一个女人，她深深地尝到了难以言明的痛苦。这是丁玲一个永远挥之不去的心结，一段尽管清清白白却不愿再回首的痛苦岁月，孤独的煎熬、脆弱的情感以及授人以柄的选择让丁玲一生难以摆脱。所以，被误解的委屈，对于“清白”的拷问，陷入无助的彷徨和痛苦，透露出的正是丁玲由对环境和人事的不满而产生的失落和孤独的情绪，小说表达的感情无疑是更切近于作者的真实心态，她渴望有这样一个主体能改变她的孤独处境。“每个人一定有着某些最不愿告诉人的东西深埋在心中，这是属于私人感情的事，既与旁人毫无关系，也不会关系于她个人的道德”。<sup>[2] 235</sup>这简直可以看作作者对自身的一份深重的怜惜！正因为这种来自心底的怜惜，文本中的叙述者“我”自然而然显示出双重品格。其一，“我”在没有见到贞贞以前，就对周围的人的议论很愤怒，对“杂货店老板一类的人”表示鄙夷；其二，贞贞这个乡村中的“异类”使她喜爱和景仰——“我喜欢那种有热情的，有血肉的，有快乐、有忧愁又有明朗的性

格的人；而她正是这样”。“我”感到了和贞贞精神上的契合，对贞贞表露出一种少见的情感认同。的确，在丁玲的笔下，贞贞被倾注着满腔的深情，取名“贞贞”就蕴含着她的“贞洁”，她的肉体虽遭到不堪忍受的侮辱，但她的灵魂却是贞洁和高尚的，是有血有肉、有人格、有尊严的人；同时，作者也是借主人公的“贞贞”之名来表白自己感情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坚贞，她实实在在也是在为自己情感的错厄和受伤的心灵辩护，努力传达出自己的清白和对党的忠诚。难怪有学者这样评断：“与其说丁玲关注的是贞贞，不如说丁玲关注的是自己，是同自己一样遭受过不幸命运的人。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贞贞的遭遇反映了丁玲的感受，贞贞的命运中有着丁玲的影子，这就使得她产生了共鸣，发生了同质同构的契合，因而写得凄婉动人”，<sup>[9]</sup>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创作特征。

另一方面，《霞村》的叙事也呈现出明显的主体性特征。虽然它创作于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时期，并且是创作于革命圣地延安，但这种主体性叙述依然强烈。文本叙述贞贞从一开始就受到乡村封建势力的压迫，她被父亲许配给米铺小老板，而不能和自己所爱的人在一起，那种痛苦是不言而喻的。为了表示反抗，在那个时代，除了去做“姑姑”，好像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在被日本鬼子糟蹋之后，别人对她的不理解 and 另眼相看，更使她感到孤独和痛苦。她没有接受夏大宝的爱情，其实是对环境的反叛。如果她接受了夏大宝的爱情，就她的身份，在农村那种封建意识根深蒂固的现实中，也是难以幸福地生活的，因为“在这广大而闭塞的乡村中占主导地位的毕竟是‘五四’之前统治中国文化的封建意识形态和小农经济培育的恶习”，<sup>[4] 129</sup>这一环境根本就容不下她的存在。但贞贞的可贵之处在于她并没有被痛苦和孤独所打倒，而是顽强地走了出去。她要换个方法活，还要活出个样子来，坚持走自己所认可的道路。“女性概念的质的规定性是女性作为人的主体性”，<sup>[10]</sup>而主体性“是人们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个人的选择和自我发展，以求自我本质的创造性完成”。<sup>[11]</sup>贞贞能按自己的意愿进行个人选择和自我发展，这对于当时的社会环境而言完全是崭新的叙事，女性正在选择走自己的道路，寻找自身的意义，而不去寻求别人的解释。这种新的叙事在小说里虽然表现得还很隐忍，但却孕育着一种新的方向，一种鲜活的生命力所激发的女性孤独意识的再次高扬，一种不论丁玲自觉或不自觉的对于当时主流话语的

对抗。因此,《霞村》的创作“可以看作是莎菲时期丁玲个人主义思想与女性主义思想的回光返照”,<sup>[12]</sup>具有深刻的主体性书写意蕴。

我们知道,莎菲时期的丁玲,通过笔下一群个性雷同的“莎菲”,决绝地表现着本真的自我,实现了女性孤独意识的张扬,其文本具有鲜明的主体性特征。从莎菲时期到延安时期,丁玲经历了一生中发生重大转折的20年。这20年里,成功与不幸、坚定与软弱、前进与彷徨、希望与失望、欢娱与痛苦、信任与误解、赞誉与打击……可以说,丁玲什么都经历过。昔日热情而爽朗、单纯而幼稚的丁玲在风风雨雨的政治生涯中,已逐渐变得深沉而老练,其创作风格与创作个性也发生了迥异于早期的变化。与莎菲时期的作品比较,《霞村》这一作品显得沉郁而典雅,“艺术上委婉细腻,新颖别致”;<sup>[13]</sup>但是,作品中“莎菲”的影子仍时隐时现。丁玲自己也曾说,像莎菲“这种类型的人物,从我后来的作品中,还是找到他们的痕迹。像《我在霞村的时候》里的女主角……精神里的东西,还是具有和莎菲相同的地方”。<sup>[5]</sup>作品充满政治性的同时难掩女性锋芒的话语,丁玲性格中倔强而又孤独的一面作为一层无法摆脱的底色始终在左右着她。从莎菲到贞贞,“其精神特质上存在着一种内在的联系:单纯里透着复杂,痛苦中满怀着希望,这种倔强而又感伤、美丽而又无所归宿的女性素质,这种强烈的自主意识使她们不甘于逆境,然而正是这种超前性又使她们陷入了举步维艰的两难境地。这种两难境地的艺术表现,都烙印着丁玲独特的个体生命体验,充溢着丁玲的原始生命力”,<sup>[14]</sup>彰显的正是作家的女性孤独意识,张扬的正是作家的创作个性,具有独特的女性书

写魅力。

#### 参考文献:

- [1] 龙泉明. 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合点上: 中国现代作家文化心理分析[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2: 374
- [2] 丁玲. 我在霞村的时候[M] // 玲文集: 第3卷.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3.
- [3] 袁良骏. 论 玲的小说[J]. 中国社会科学, 1985(4).
- [4] 孟悦, 戴锦华. 浮出历史地表[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128
- [5] 丁玲. 玲论创作[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5: 336
- [6] 弗尼吉亚·伍尔夫. 女人的职业[M] // 王斌, 等, 译. 伍尔夫随笔全集: 第3卷.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367.
- [7] 王轶. 阿毛姑娘: 苦楚的文化悲剧[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2004(5).
- [8] 别林斯基. 别林斯基论文学[M]. 梁真, 译. 北京: 新文艺出版社, 1958: 47.
- [9] 田金霞. 论 玲的孤独[J]. 理论与创作, 1995(6).
- [10] 刘思谦. 中国女性文学的现代性[J]. 文艺研究, 1998(1).
- [11] 蔡翔. 主体性的衰落[J]. 文艺争鸣, 1994(6).
- [12] 董炳月. 贞贞是个“慰安妇”—— 玲《我在霞村的时候》解析[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5(2).
- [13] 杨义. 中国现代小说史: 第2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 260
- [14] 王仲生. 历史追踪中的双重启示——试论 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J]. 北京教育学院学报, 2003(2).

(责任编辑: 黄声波)